种麦者

□周 习

我去找郭元亮的时候，他正在回家的路上。郭元亮曾当过28年的支部书记，搞了40年的小麦良种培育。他所在的山东寿光北洛镇北徐村一度成为全国高产粮种植技术的集散地，郭元亮也成为人们眼中的“小麦良种专家”。他业余时间爱写诗，喜欢文学朋友，曾帮助过从省里来寿光改造的右派作家肖明，从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后，将种麦的情怀直抵诗歌，出版了一本诗集叫《绿潮颂》。

1 郭元亮怀里揣着一个袋子，两拃长短，小心翼翼很金贵的样子。74岁的他弯腰弓背，躲避公共汽车上拥挤的人群，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揣着一个婴儿。上车后，坐在司机后面的一个长头发男青年赶快站起来给郭元亮让座。于是郭元亮就坐在了公共汽车司机后面的很安全的位置。这是2006年10月的一个下午。

这趟公共汽车从县城跑寒桥镇，必经郭元亮住的北徐村，确切地说是经过北徐村的那条生产路，生产路两边各有一溜大杨树。北徐村的这条生产路与市里的其他生产路不同，村民们管这条小路叫做“总理路”，说是朱镕基、温家宝、姜春云这三位总理级人物都从这条小路上走过，都是为了来看北徐村村支书郭元亮种的小麦。郭元亮选择这条生产路回家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郭元亮每次都喜欢从这里过，这里会勾起他很多自豪感。人生有自豪感才会有奔头。

坐在车上，有人问他：“郭书记，您又去买种子了？”他笑着点了点头。郭元亮觉得，一个村里的带头人，就要对村民负责，首先要抓好粮食生产，让老百姓有饭吃。提高粮食产量，靠科学种田，首先要有良种。郭元亮对两委班子成员说：“只要把省内甚至全国对路的良种弄到手，事就成了一半。”

几年前，郭元亮要去淄博买小麦种子，恰好村里一位叫郭刚的村民开着拖拉机去淄博买焊条，为了省路费，郭元亮坐着他的拖拉机一同去。走到淄博一个叫周村的地方，司机开着拖拉机走错了门，进了一家门口很小的单位，往外倒车的时候，郭元亮的腿被撞了一下，一看没出血，他也没在意，一心想早一点买到种子，就催促司机继续走。到傍晚买上种子，郭元亮的腿都肿了，去医院检查，是粉碎性骨折。晚上，天凉了，周村的人看不过眼，给了他一件棉大衣铺在拖拉机上，将他拉回了家。伤筋动骨100天，本应该卧床休息。可是回来后，正好赶上忙麦，县里督促麦收的工作组早已住进了村子，他要到村委会大喇叭里给村民开动员会，就让人抬着去办公室。整个过麦期间，他就这样被抬着来来回回。

后来他村里买了辆旧车，给老少爷们儿婚丧嫁娶用，他出门也用。司机跟着他出发，饭也吃不饱，那一年，到淄博济南东营去买种子，一路上跑呀跑呀，连顿饭也舍不得吃。司机抱怨说，人家当司机跟着领导好吃好喝，我跟着出去没饭吃，根本没时间停下来吃饭。郭元亮说：我买了临沂的煎饼，这煎饼不怕坏，大热天的，喝点带来的凉开水，饿了，吃块煎饼。司机说：煎饼太筋道了，根本就咬不动，把我饿的，一窝火。

公共汽车司机说：郭书记，光顾着说话，我差点把车开过了，生产路到了，您下车吧。郭元亮小心翼翼地抱着怀中的5斤麦种，眯起眼睛四处张望，他看到路边熟悉的站牌，站牌旁边就是村南头的生产路。

2 小麦，虽然分冬麦和春麦，然而鲁东地区还是种冬麦的多，有东北米高密麦之说，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北徐村就在高密市的西北侧。冬麦过冬前种上，出苗，下几场大雪，给麦苗盖上了厚厚的棉被。春风一吹，麦苗泛青，然后随着气温的上升，分蘖、出穗、小满，五一前后进入芒种，最后收割。据说中国的楼兰，一个叫肥沃月亮湾的地方，最早发现小麦。世界上自北纬17度到50度都有小麦种植。小麦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口粮之一。

1995年冬天，镇上来通知说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同志要到北徐村看小麦。远远地，郭元亮就看到几辆车从这条生产路上过来了。温家宝走下车，拉着郭元亮来到麦田里，问了小麦生长和管理情况，对郭元亮说：“不错。找个地方谈谈吧。”郭元亮事先接到的通知是“汇报，不能超过18分钟”，可没说到村民家里视察。一点准备也没有，怎么办？村民郭子秀家靠近停车的地方，郭元亮领着温家宝进了郭子秀的家门。郭家两口子刚从果园浇地回来，一身泥水，温家宝同志毫不在意地坐在他家的炕沿上，拉着郭子秀的手聊起来，问他种了什么，养了什么，一年收入多少，对生活是否满意。郭子秀并不知道身边坐的是中央领导，心里并不紧张，问什么回答什么。当年，郭子秀家种着五亩果园，养着牛、小尾寒羊、兔子，种着粮田，人均收入已达万元，生活宽裕。温家宝同志不住地点头，表示满意。原定18分钟的汇报时间，一坐一聊，已经48分钟。起身前，郭元亮大胆提了一个“要求”：“书记，照张相吧？”温家宝同志点点头说：“很好。”

我在郭子秀家的墙上看到过这张合影。北徐村的村民和郭子秀一样自豪，他们以国家领导人来过北徐村为荣。郭子秀常在村里说：“一照相俺才知道这是大官呀。早知道的话，俺就穿上新买的皮鞋和西服，都是准备过年的新衣裳，花了800多块钱。”

转眼到了1996年的春天，倒春寒，冷风吹得人裹紧了大衣，小麦经受了考验。3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到山东考察，他又从这条生产路上来了。郭元亮从人群里看到了电视上已熟悉的两道剑眉。他穿着一件乳白色的风衣，运动鞋。郭元亮站在省市镇领导的背后，轮到他和朱总理说话了，朱镕基总理一改严肃的表情和站在路边的这个老农民开起了玩笑：“你的头发这么黑，是染的吧？”郭元亮说：“是呀，为迎接你呀，我第一次穿新西装、新皮鞋。”朱镕基看看自己的装束：轻松的夹克上衣，旅游鞋，他笑了。他来到北徐村前的麦田里，踏着松软的土壤，看小麦长势，问产量，让郭元亮走在自己的身边，紧紧抓着他的手，说：“你的办法好，全国要向你学习。”总理的话多有分量呀，郭元亮觉得自己搞小麦搞对了。

这么多年，郭元亮先后引进试种了石家庄54号、津丰、济南13号、鲁麦7号等240多个小麦品种；引进试种了烟单4号、鲁单16号、稳千一号、西玉3号等260余个玉米品种。他寻找良种的足迹至河北、河南、陕西、甘肃、辽宁、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数十个县市。

第三位从这条路上走来的总理是后来的姜春云副总理。姜春云副总理来的时候，玉米吐着红红的缨子，粒子很饱满，副总理就夸他的玉米长得好。郭元亮说：“还不是跟着你学的，你在桓台蹲点，我专门去学习，淘换种子来种的。”姜春云在山东当省长的时候，在桓台蹲点抓小麦间作的高产玉米。

当年的山东省省委书记吴官正曾对郭元亮说：“你种的小麦比美国的都好。”还有的领导说：“1958年是放假卫星，你这次是放真卫星。”

3 郭元亮从怀里将这一布袋小麦提在手上。这是妻子专门用粗布做的盛麦种的小布袋。口上一条带子，一拽就扎紧口了。从这条“总理路”上走，如果说和这条路的感情，郭元亮在村里应该为第一。刚才在公共汽车上人挨人，他怕挤坏了，就像揣孩子一样，将麦种揣在怀里。下了车，他摸了摸怀中捂热的5斤小麦种子，长长地出了口气。总理路就像一根旗杆，伸向村里，两侧大树之外全是白色的大棚，大棚里有劳作的人。他的思绪飞到90年代，他仿佛看到一拃长短密密实实的麦穗你挤我我挤你，微风吹过来，左右摇摆，刷刷一刷刷。这种画面是属于郭元亮的，存在于他的脑海中，也存在于他家里的一盒录像带中，那是本地的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给他写的剧本并拍摄的。这剧本中不光有成熟的小麦，还有国家和省一级的小麦专家来北徐村的画面。

他仿佛看到，碧绿的田间走来了孙永年教授。和孙永年打交道的时候，也是麦子长得最好的时候，村前村后全是麦子，那个麦子呀，长势可喜人了。那麦子在眼前晃，麦芒、太阳，一切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他仿佛看到五月阳光下，孙永年和学生们在地里选种。

孙永年这个省级科学家是郭元亮通过报纸结交的。郭元亮有天天看报纸的习惯。先看完公费订阅的《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再仔细地读自费订阅的《农业科技报》《文学报》。也巧，1996年他从《农业科技报》上得知鲁麦23号被胜利油田的孙永年教授研制成功。孙教授正在山东的桓台四大队当小麦顾问。郭元亮想，孙教授能来北徐村实验小麦良种该有多好呀，北徐的土地经过改造都成了良田，各种条件具备，就差良种。为了让孙永年给北徐村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他要去拜访孙永年。

经过打听，郭元亮找到了孙永年在东营的家。他向前敲门，没人。邻居听见了，出来冷冷地问：“你找谁呀，你是他什么人呀？”

“我找孙教授。”

“他不在家。”

“我找他是问小麦的事。”

冷漠的邻居才告诉他，孙教授在桓台。

好不容易走了3个小时去了桓台，已是下午了，郭元亮到了桓台村委，值班的小伙子问：“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不认识，你找人家干吗？”

“我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的。”

“那我们给您找找。”

半天回来了，说：“他回省里开会了，过一天您再来。”

第二天，他又去了，是坐公共汽车去的，又扑了个空。他心里那个恼啊。

第7次上，终于在桓台村找到了孙永年教授。

敲开孙教授的门，孙教授很诧异：我是搞小麦良种研究的，帮不上你什么忙吧？郭元亮说：“我看报纸，知道您才研究出一个新品种，想着种种试试。”孙永年一惊，农民都是被动用种子，镇上给什么种子种什么，没碰上有自己主动找种子的。有些奇怪。于是，问他，为啥？他说自己从年轻时喜欢搞科学实验，知道有好种子才能种出好粮食。孙教授这才看到郭元亮手里还提着袋20斤重的面粉，他说这是用自己培育的种子种的，已磨成面粉，叫他尝尝。

孙永年也是个认真的人，马上让爱人蒸馒头，果然这馒头很香很筋道。郭元亮说我们北方人长得又高又大就是这又软又暄的馒头养的呀。

两人在一起谈小麦，谈着谈着天晚了，孙永年留下他吃饭，开饭前，孙教授邀请郭元亮喝一壶。郭元亮说，在淄博上学时，见到过吕正操，吕正操是《平原游击队》李向阳的原型。孙永年说他家是河北的，对这个故事太熟了。说着说着，发现两人都爱好文学和书法。郭元亮要求他去村里看看。后来孙永年果然和爱人来到了北徐村。下车的时候，孙永年的爱人差点跌倒，问及原因才知道膝盖有病，是关节炎。郭元亮认识镇上一个专门治关节炎的，就自己掏钱为孙夫人治病。孙永年被感动了。他把研究的最好的种子和最新的信息毫不保留地送给郭元亮。

就这样，郭元亮虽然是一位农民，却和当时农业领域的顶尖人物对话、交流，甚至成为一生好友。除了孙永年教授，当时农业界的很多精英都和农民郭元亮成了好朋友。他们向郭元亮传授技艺，把自己研究的良种、项目交给他做实验。余松烈教授是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国内著名的小麦良种培育专家，他曾经对郭元亮说过，你们北徐村的小麦配套生产技术给我们这些专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在每年小麦浇冻水、扬花等关键时节，余松烈都会带领全省小麦专家在封冻前到北徐村来，他拔起一株小麦，仔细数一数分蘖的节数，点着头说：“嗯，6个大蘖，国内少见。”

郭元亮生产的小麦每年都作为良种推向社会，遍及5省9地市26个县6000多个村庄。到了1997年，北徐村600亩粮田全部变成试验田，北徐村也变成各级科研机构和农业学校的实践基地。1996年，经全国及省小麦专家验收鉴定，全村小麦高产地块亩产达1316.8斤，玉米高产地块达1689斤，实现了“吨半粮”的目标。

绿小麦、黑小麦、高蛋白小麦、糯黄白玉米、珍珠高粱，这些北徐村的新稀特品种，都是郭元亮亲手捧回种子，亲手培育的。

4 郭元亮出生在山东寿光，上小学的第一天就碰到日本鬼子到村里扫荡，刚进校门就被父亲拖走，一家人东躲西藏，没东西吃，3天后回家看到村子被烧，房屋倒塌，一辆大马车上堆着木头，祖父说这是鬼子烧牛吃剩下的，还有一大锅鸡肉炖粉条。郭元亮经常提起这段60多年前恍如隔世的记忆。他说，大概我这一辈子注定要干的事，就是让大家吃上饱饭。

1953年，郭元亮从昌潍第六速师毕业后，分配到淄博十四中当教师，不料，全国刮起了“浮夸风”，大家在学校没饭吃，饿得头昏眼花。只好回家来，走到村头，看到40岁出头的父亲饿得弯着腰、拄着木棍、双腿浮肿在村头等着他，骂他道：“孩儿啊，你还知道回来，你爷都快饿死了！”郭元亮流泪了，父亲推了一辈子小车，他是父母惟一的孩子，平日里隔几天父母会烙上饼推着小车去淄博给他送。如今父母没饭吃了，自己却无能为力。他很伤心，发誓要种出好多粮食，让亲人们不再挨饿。

60年代，郭元亮所在的人民公社成立了寿城第一个农业科学试验队。地点就设在北徐村，意气风发的青年们对小麦、玉米、红薯都进行科学实验，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之间，红卫兵们把试验产品打了个稀巴烂，试验队解散了，郭元亮只好回家当一个普通的社员，但农业科学实验的种子却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1968年，有文化的郭元亮在生产队里很快被大家赏识，老队长说：“大伙儿选你当队长，你要好好干，年轻嘛，可以多压压担子。”郭元亮说：“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当生产队长行，我可是愿意在田里搞农业科学实验啊。”老队长说：“你只要领着大伙吃上饭，咋样都行。”

郭元亮好像得了尚方宝剑，他要自己去买好种子种上。于是背起行囊，出去找好种子了。几天回来，津丰一号、石家庄54号、反修二号、济南13等，每块地一个厚爱品种，他每天去查看。该浇水了，该施肥了，一点也不马虎。芒种过后，其他五个生产队仍种原来的铀子和昌乐5号。等到打下麦子来，郭元亮自己的生产队产量远远高于其他生产队。分了口粮留下储备粮，还余1700斤。老队长笑了，吧嗒着烟袋说：“哦，行，好样的！”

果然是好样的，镇上来选举，他高票当选为村支书了。组织委员找他谈话：“郭元亮，你有什么和组织要说的？”他说：“提一个条件，一定要组织答应，要不，坚决不干。”组织上以为他为村里要油，要车，或者要贷款，出乎意料的是，郭元亮的条件是：当支部书记可以，必须保证让他搞农业科学实验。

镇上的领导当即笑了，说：“这是好事呀，为什么不答应你？”

领导们都很支持他，郭元亮记得当年35岁的寿光市市长李群，到了麦收时节，顶着炎炎烈日，带着30名市府干部职工，来北徐村帮助收割麦子。郭元亮吩咐村民给市里干部烧绿豆水喝，而干部们把捎来的两个西瓜给村民吃。当年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王坤山从陕西带回一个大穗形新品种，分别种在试验田和郭元亮自己的小菜园里，试验田里的小麦过了年全部冻死，小菜园里的没死，打了十几斤，因品种抗冻性差，第二年淘汰了。

当时的县委书记王伯祥认可他，到潍坊当了市长后专抓农业，郭元亮的万亩小麦高产基地就是他的试点。每年开灭茬会时，郭元亮家里靠墙挂一溜儿几十把农具，肥料摆满生产路，一声令下，市领导和各级干部一起动手，锄地、撒肥料，场面令人感动。在王伯祥的眼里，郭元亮是最值得信赖的支部书记，是农村支部书记中的带头人。在县里三干会之前，有个农业会，王伯祥一般会安排郭元亮在会上做重点发言。

郭元亮带头育出的良种撒遍江北大片土地，他却没有因此致富。但他从没停止过对良种的搜索，培育小麦良种成为他一生的挚爱。不少看到报纸的农民去向他讨要种子，他都爽快地出让。郭元亮认为一粒好种子，就有一份好收成。一个农民什么时候也该这样想。

5 郭元亮家门口前的那块空地呈长方形，贴着路的顶头延伸。郭元亮可看重这块旗帜样的地了，那是他的最后一块小麦试验田。没有特殊情况，他现在心里规划着这5斤种子明天就种在空地的一个角上。去年这块地上种上了17个品种，今年再种上这个，就是第18个了。这次全国在济南开农展会，他没扑空，买到了没种过的最优质的小麦种子——“长江一号”。

妻子有一只木头瓜子，麦种打下来，她坐在自制的场院里，拿着这只木头瓜子，啪唧啪唧砸下来，黄澄澄的麦粒就出来了。妻子对郭元亮好，郭元亮说啥她就做啥，灵巧聪明，一学就会，是郭元亮的好助手。去年这个时候，他把优质种子拿回来，自己种不了，就让侄子帮忙种上。土地调节问题他说了不算，农业结构调整是县里的事，粮食实验田没有了，他就把侄子的菜园当试验田，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让妻子天天守着怕鸟吃。

郭元亮已经看到他家门前的二亩地了，是侄子郭子春的菜园。村里调整土地的时候，郭子春在外面工作，他知道叔叔郭元亮酷爱培育小麦良种，照顾他做了试验田。这时试验田四周全是大棚，当地有一亩粮十亩棉、一亩棉十亩菜、一亩菜百亩花的说法，追求经济效益，全村都改种蔬菜大棚了。然而世界上偏偏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郭元亮就觉得种小麦好。那一年自己挨饿和父亲拄着棍子在村头的画面时刻提醒着他，啥时候也不能没粮食吃。

“搞到种子了吗？”是老伴的声音。老伴在门口坐个马扎，拐杖放在脚下。老伴慈眉善目，结婚的时候，一个24岁，一个17岁，比他整整大7岁，啥事也依着他，从没和他红过脸。郭元亮从没嫌弃过老伴的年龄大，两人相互支持过日子。郭元亮种小麦入了迷，不管成功与失败，妻子从没有讽刺过他，单凭这一点，郭元亮庆幸自己找了个好妻子。

可是今天老伴脸上不舒坦，眉头皱着。郭元亮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大半辈子了，妻子有个什么想法，郭元亮第一时间会猜测到。

老伴的脸越发阴沉。

“搞到了？”

“嗯，明天就开始种。”

“可村里说，郭子春的菜地明年就收回去。”

唉！抚摸着这袋种子，郭元亮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2016：中国报告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项工程

新源里西1号楼

□景俊美

生命的历程，在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换中完成。一些人、一些事，某个地方、某个节点，给生命留下一段永远抹不去的回忆，滋润一生。经过时间的冲刷，曾经波澜壮阔的都归于平淡，甚或极度难挨的日子，也成为上天的赐福。如果从时间的长度上来度量，新源里西1号楼是除故乡之外，我待的最久的地方，也是我求学以来情感最浓重的所在。

2007年9月10日，我步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大门，入住新源里西1号楼。我的第一位室友主攻钢琴与声乐，高我一届，长得白白胖胖，说话大大咧咧，是个乐观派。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总是看到她很忙，沟通虽然不多，但只要她在，你就会知道人间烟火的快乐。第二位室友是一位访问学者，她博士毕业后来戏曲研究所访学，特别懂得照顾人，我们总是一起去食堂打饭，周末一起爬山、逛公园，更让我感激的是，因为她的缘故，我有更多机会走进剧场，欣赏包括传统戏曲在内的各种演出。第三位室友是电影学博士，长相俊丽，不太爱说话，喜欢待在宿舍看资料、写东西，或者打扮得漂漂亮亮出门。我们聊得最多的是电影，她给予我的评价是——不管多烂的片你都会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看完。这话一点不假。其实不只是看电影，包括生活中的很多事，我常常不分主次，都要眉毛胡子一把抓。第四位室友是我的同学林姐姐，我们在一起的故事不只是从宿舍说起，还有三年的同学情、现在的朋友谊，以及作为姐姐她给予我的种种照顾。林姐姐总是喜欢夸奖人，前两年她自己租房子的时候，同学们在她的住处一起聚餐，她总是邀上我，说我做的菜特好吃，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佳肴。事实上不是我多么会做菜，只是用心而已。四个室友，可以说亦友亦师。这种氛围，一生再也难寻。

除了室友，在新源里接触最多的人是食堂的师傅。6年的时间，6年的饭食，一顿一顿的叠加，你可以想象这个数字的庞大。李哥是食堂的掌事人，对人和蔼，做事稳重，也许是因为我个子高、辫子长，特征明显，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他以及其他师傅都相熟起来。学习有时候会让人忘记时间，等下楼打饭时往往已经没有饭菜，师傅们常常会挤出他们的口粮给我一些，让我感到别样温暖。新源里温馨的情景，是食堂里同学们聚在一起聊天，大家不一定是一个班的，也不一定是同一届的，但只要坐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不同的艺术门类、不同的知识储备就会碰撞出火花，激发学术研究的思路，积淀同学之间的情分，以至多年后我离开新源里，师弟师妹们仍是联系密切的朋友。

小赵是新源里的常青藤，在西1号楼里已经度过了近20年的春秋。从门卫到勤杂工到现在的“大总管”，小赵做事认真，虽在最平凡的岗位，却能尽心尽力做到最好，所以作为“打工仔”，小赵才能在京城的繁华地段落脚，一待就是20年。有一年，一位女学生在宿舍做饭忘记拔掉电源，引起大火，小赵是第一个冲上去救火的人，等消防车到来时，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如果不是他的勇敢，我们不敢想象那将是怎样一场灾难！当然，小赵其实不小，从师姐那里秉承这一称呼后，我就很少改口，反而觉得这样的称呼很亲切，有时候我们也叫他“赵”，他总是用憨厚的微笑回应大家。

除了食堂，最忆西1号楼的自习室。和第一位室友同住时，她爱神侃，我虽多了欢乐，但有时候又想找一个相对清静的空间，自习室是最佳选择。我选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冬可观雪，春可赏花，夏日听雨，秋日看叶。如今听起来似乎特别风花雪月，事实上大部分时间是面对书籍和电脑，或看或写，是我修为的主业。在自习室的日子，我还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作息规律，生活充实。黄山谷有云：“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不爱读书者，一定不能体会此中的深意。如今，日常事务性工作越来越多，但只要这一天我读了书，便觉这日子没有白过。反之，总觉得缺点儿什么。在自习室，我完成硕士论文、撰写期刊论文、备考博士，之后是攻读博士、继续写学术文章、最终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工作后我的宿舍很小，读书时的书便放在了同学住处。后来换了大一点儿的房子，将这些书搬回，整理它们的时候竟有小小的激动，因为那些书就像故友，载满了我当时的感想，如今读来都是感动。

新源里西1号楼还有一些空间，是用以传承文脉的。比如四楼楼梯口的大师墙，挂着梅兰芳、程砚秋、张庚、冯牧、胡风、冯其庸、周汝昌、杨荫浏、缪天瑞、阿甲、侯宝林、黄宾虹、王朝闻等大家的照片与简介，这些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脊梁。除了学习场所，新源里附近还有几个地方令人留恋：一是亮马河，河道虽不宽，水也不深，却是伏案一天的学子散步的好去处。三五好友邀约，在傍晚时分舒活筋骨、观景赏花、畅谈心绪，是为一乐事也。二是早市，那里的水果、蔬菜新鲜又便宜，甚至吸引来自远郊区县的消费者以及使馆区的“中国通”。三是379路公交车，因为学校上课的地方在惠新北里甲1号，住却在新源里西1号楼，379是连接两地的惟一“专列”，早晨上课的时候，学校雇的班车也是379，这个流动的空间便成为大家相识、相遇、相知、相伴的所在。看早晨奔跑的脚步、晚上舒缓的脚步，车上呼朋引伴的热烈，你便明白什么叫年轻！

2013年7月博士毕业，我离开了新源里。虽然时时念起，再次踏入的机会却越来越少。昨日下班之后，我突发奇想去新源里看看，可是走近时我却拐弯了，远望一抹夕阳下的彩楼，近乡情怯的忧愁让我犹豫——我去找谁，谁还记得我？